

温柔地解构,以浪漫之名

——也评电视剧《欢颜》

► 10版·文艺百家

写信者奥斯汀

她的书信是理解其小说的一把钥匙

► 11版·经典重读

壶天世界的造型与真相

中国古代艺术家何以不断造出以壶为原型的器物

► 12版·艺术

从暑期档看见中国电影韧性与深度

郑扬

暑期档常被视作捕捉中国电影产业脉搏的最佳观察窗口。这一档期以其赛程之长、新片之多,得以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面、全景的电影市场图景。

2023年的暑期档是中国电影产业自行业复苏以来的标志性档期,一系列国产影片以其创新的艺术探索和市场策略,成功地占据了档期的主流位置。有的影片力图展现民族文化的深厚根基,在中华传统美学现代影像表征上进行探索。部分影片立足于深挖现实,以其对日常生活与社会现象的敏锐洞察,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深度与锐度并存的光影世界。尽管这些影片在艺术质量和水准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有的在艺术处理上仍有待深化与完善,但从它们在市场上的反响来看,无疑为未来的电影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神话与历史的当代表达:《封神第一部》与《长安三万里》的文化诠释

2023年暑期档,被戏称为“节气博主”蛰伏四年的《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终于走入大众视野。这部影片在较长的宣发周期中持续受到关注,因此在上映后引发了票房上的长线反应。

在电影市场的季节性分布中,暑期档向来被视为年轻观众的主导时段,尤其是对于神话题材的热衷。其中,青少年这一细分群体对于动画形式的神话影片如《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和《大圣归来》等展现出了显著的消费偏好,从而使得这类动画在暑期档中确立了其市场地位。然而,这种市场格局也意味着对于真人神怪片的需求在暑期档中存在一定的空缺,特别是针对那部分已经跨越青少年阶段但仍对神话题材保持浓厚兴趣的年轻成年观众。尽管如《捉妖记》和《悟空传》这样的真人神怪片在过去的暑期档中有所涉足,但这一类别在暑期档的策略布局仍显稀缺。因此,《封神第一部》之于暑期档,不仅是对档期内真人神怪片市场的一次探索,同时也是对这部分观众需求的积极回应。

《封神第一部》呈现了显著的“影院感”,作为一部神怪特效大片体现了电影媒介的“造梦”能力。虽说部分场景的美术效果未臻完善,但整体性较强的工业化制作水准仍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气势磅礴的中国史诗。然而,电影的成功并不仅仅依赖于特效,更重要的是其在市场上的接受度。回想当年张艺谋导演的《长城》,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追求了史诗的宏大,但可能由于其剧情的不足而未能完全达到市场的预期。相较之下,近年“封神”题材动画片如《新神榜:杨戬》《姜子牙》和《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客观上为这部影片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市场环境和观众基础。这印证了基于经典文本的影视改编仍然是一个相对稳健的策略,同时验证了“封神”题材的持续市场吸引力。此外,该影片在忠实原著的同时,融入了现代人的价值观,如放大纣王的人性弱点,改写妲己的刻板印象,依照现代性别逻辑重建了人物的心理;又如,通过刻画姬发在善恶之间的抉择,突出自我选择的重要性,放大人物自身的主体性。从这一视角而言,该片既可作为对明代志怪文学的现代阐释,也是一次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尝试。

与《封神第一部》同样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像化表达上进行探索的还有《长安三万里》。有趣的是,作为“国漫爆款孵化”的暑期档,此类作品往往以神话改编或新说作为其主要内容,近十年如《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作品都在此期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只不过这些作品在表现中国美学时,与中华文化基底的联系仍显不足,例如《大圣》更多地展现了简化的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而《哪吒》则在人物造型上受到了欧美动漫的影响。笔者在早前撰文指出,许多国漫作品在对待传统文化时,往往采用简单的拼贴和挪用,试图构建一个“他者”的视角中的奇观,导致作品的核心价值与其影像呈现之间存在明显的断层,可见有些作品创作动因并非源自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生力。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长安三万里》至少是走出了国漫类型重复与内容局限的困顿,而且通过贴近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唐诗文化,来展现气韵生动的中华美学。影片不仅重现了大唐盛世的壮丽景观,更通过细致的描绘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影片以“长安”为象征,展现了一代士人对理想的追求

和对情怀的遥望。电影中的角色们都是相会于江湖的失意者,他们的人生故事被电影提炼为对现实与理想之间鸿沟的探索,以及对人在宇宙中的渺小以及随之而来的哀怨的反思。正是基于这个相同的原因,电影中李白选择逃避现实并委身于诗歌艺术的避风港,而高适则走上“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的报国之路。两人之间性情与选择上的这种强烈反差也成为影片在结尾处用“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句将观众情感推向高潮的重要前提。在这一基调当中,《长安三万里》以浪漫主义的笔触,以唐诗为媒介联通了这些角色与观众之间的情感,从而揭示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历史的连续性。它所展现的内容超越了单纯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传说,并尝试以极为高亢的笔调来刻画唐代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情感,兼具教育意义与文化价值。

现实主义的新探索:青年导演的视角与创意

2023年暑期档现实题材影片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将类型片的叙事范式作为创作基础,切中社会的关注点,并试图在叙事手法、影像风格、类型跨越等方面进行创新。近年,现实题材影片是电影行业的“新风口”,在国家政策的提倡下,涌现了一系列社会和市场效益俱佳的力作。从制作层面上来看,这些现实题材影片往往属于中小成本,但其“贴地飞行”的当下性和鲜活感,使其能够密切关注现实生活,关怀百姓苦乐,反映世间百态,并以写实风格呈现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触及观众的心灵,达成情感共鸣,成为能够在市场上“以小博大”的重要产品。

例如,《消失的她》切中社会对“孕妇坠崖案”的关注,以谜题电影的结构与观众展开智慧对决,它试图通过构建环环相扣的悬疑情节来创造反转并营造期待落差,同时挖掘了关于真实、记忆与身份的主题,以期使观众得以在解谜的过程中沉浸于电影的情感深处。《孤注一掷》则通过多层次的叙述与群像塑造,全面呈现了网络诈骗的复杂生态,同时深入探讨了其背后的社会根源。《我爱你》刷新了观众对老年题材电影的认知,抒写的不仅是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并在内涵上指向关于时间、记忆和遗忘的主题。《学爸》聚焦升学焦虑议题并展开反思,重构了亲情片的表达方式与情感内核。而《八角笼中》试图将现实主义与体育电影风格相结合,呈现了留守儿童群体所面对的艰难挑战与情感状态。

引人注目的是,现实题材影片背后的创作者大多数都是青年导演,因此天然在视角选择与创意阐发上具有优势。例如韩延和申奥,作为近年来在片场崭露头角的新锐导演,他们的作品显示出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深入挖掘的渴望;王宝强虽然以演员身份更为人们所知,但他在《八角笼中》中展现了其“进步神速”的导演才华;大鹏通过《热烈》这部作品展现了他在电影创作上的多面性;苏亮则依靠《学爸》完成了他从编剧到导演的转型。青年导演的涌现强调了现实题材电影在培养新一代创作者中的关键角色,同时也突显了其在当代电影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今年春节档的市场复苏曾为电影行业注入了信心。虽然这一常规热门档期赛道较短,但其票房成绩为全年其他档期释放了积极信号。与此相对,暑期档作为全年最长的档期赛道,其持续热度更具有市场复苏的象征意义。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新片亮相,累计超过160部。与“全民性”的春节档形成对比,暑期档过去常以“青年性”为主要特质。但今年,它已经开始逐渐展现出“全民性”的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现象级的影片层出不穷,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面对进口大片的竞争,国产电影仍然占据了主导地位,票房前五均为本土之作。

这一趋势展现了国产影片的韧性和深度。它们已在票房上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中流砥柱,更在内容深度、叙事手法和技术应用上都展现出不断迭代和超越的趋势。有理由相信,国产电影未来或可在挖掘本土文化、传承民族美学上企及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

▼近年,现实题材影片是电影行业的“新风口”,在国家政策的提倡下,涌现了一系列社会和市场效益俱佳的力作。《学爸》即为今年暑期档现实题材影片之一,聚焦升学焦虑议题并展开反思,重构了亲情片的表达方式与情感内核。图为《学爸》剧照。



文学新观察

当代青年写作:从细节和碎片出发,与历史对话

刘阳扬

青年写作一直是文学界热议的话题,何为“青年”,如何定义“青年作家”,似乎也有着不同的选取标准。不过,正如“现代”概念一样,“青年”也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词汇,“青年”的定义也会随时代的发展产生变化。因而,与其讨论“青年”所限定的年龄范围,不如从写作趣味和精神指向上观察当下的青年写作。

“青年”一词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一直被赋予超越年龄的更多意义。“百年中国青年的100个关键词”中,“五四精神”“觉醒”“追求真理”“理想信念”等词汇占据了前排位置。然而,来到当下青年文学的创作现场时,整体性的阅读体验却与这些词汇甚少重合。迷茫、忧郁、焦虑成为小说说教者的共同情绪,写作者们不约而同地不再选择“走出去”,而是选择“回退”“蛰居”,在一座城市、一个街区甚至一间房间挖掘生活的点滴。这种细节化、碎片化以及不断“向内转”的趋势也被评论界所关注。在近期大大小小的关于青年写作的研讨会上,这一问题被反复提及,而对历史、经验和“宏大”的疏离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青年写作的共性。

不过,关注“局部”,关注城市生活的微小细节,关注各自的具体问题和细腻的情感网络,这种看似“缩圈”的书写方式,或许正是青年作家们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时代做出回应。

城市角落与“小人物”的困境

王占黑的小说集《街道江湖》和《空响炮》集中关注上海邻里街坊的生活,她把目光聚焦在老人、下岗工人、理发师和小商贩群体,以邻居、熟人组成的社区为切入点,在呈现普通人的生活状态的同时,凸显出老社区里的烟火气和“英雄气”。表面看来,王占黑的目光很少超越这个熟悉的老旧社区,她所反复书写的人物,如小花旦、美芬、阿德、李清水等,都是平凡的小人物,他们无法逃离时代的裹挟,被迫承受着变革的代价。但是,他们并非不关心历史,而是已经将历史内化为生活和情感的一部分。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呈现了显著的“影院感”,作为一部神怪特效大片体现了电影媒介的“造梦”能力。该片在上映后引发了票房上的长线反应。图为《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剧照。

在《去大润发》中有两座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建筑,大润发与宝塔。宝塔是存在于个人世界的私人记忆影像,以飞鸟投塔的意象关联着空袭的集体记忆,而随之而来的惊悚和恐怖的情绪,也将毁灭现代人自我保护的外壳。而大润发则贯穿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在动荡的生活中犹如地标,以温情的姿态让“我”得到慰藉。王占黑所塑造的人物网络,似乎落后于城市文明的发展步伐。在高速发达的现代文明背后,这类落后的老旧街区并不会被认为是城市的代表,但其所承载的一代人的记忆却不会被轻易抹去。这些老社区的居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是也能从“局部”生出普遍性。他们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也正是他们,这些具备英雄气概的普通人,支撑起城市发展的摩天大楼。

朱婧的小说集《譬若檐滴》和《猫选中的人》同样关注日常生活细小的、不为人知的小事。她曾经以“希望那微弱的声响在此时能被听见”来阐述自己的小说创作观念。因而,在处理具体题材的时候,朱婧所采取的策略是不断向下和向内,从社会的基本单元入手,以绵密的语言和繁复的意象指向暧昧而模糊的多重可能。《圣女的救济》《股公司的爱情》和《那只狗它要去安徽》等小说,将女性的成长与爱情两条线索相联系,不断探索着女性如何在生活的压力下积蓄起抵御世界的坚韧力量。在《猫选中的人》中,城市人的最佳伴侣“猫”成为主角,以他的视角重审人类生活的真实。小说在时间向上依然朝着童年的成长经验不断挖掘,将几代人的情感娓娓道来,以一种冥冥之中的宿命之感给了“我”“被选中”的笃定,也让“我”在亲情中寻到不断前行的力量。朱婧对城市生活的侧面的呈现,一方面构造起市民生活的多重的审美风貌,另一方面也将宏大的现实不断内化,走向一种博大的、人性的共性。

从乡村出发:逃离或回望

当然,青年作家们的笔触并非不触

及乡村。他们从自身出发,寻找着触达乡村的合适角度。魏思孝长期以乡村青年为书写对象,展现他们的空虚和迷茫。在《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中,魏思孝塑造了一群被现实生活围困的焦虑青年。他们无所事事,在乡村的剧烈变革中难以寻得自己的位置。近作《诗人》则为文人群体画像,书写处于城乡边缘的青年进城后的痛楚与苦闷,再次阐释“诗人之死”的文学主题。不过,小说中出现的“我潜藏已久,现在要浮出水面”描述,似乎暗示了一种更大的可能性。在长篇小说《王能好》中,魏思孝已然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乡村图景,他以摄像机的视角,对乡村民俗民情进行多角度地挖掘,在人物塑造和风景呈现上都指向了一种更大的可能。

郑在欢也偏爱以乡村为写作的出发点。在《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今夜通宵杀敌》和《团圆总在离散前》三部小说集中,乡村少年、打工青年成为他重点表现的对象。郑在欢以驻马店为基点,一方面表现荒野坟地的乡村轶事,一方面也在思考着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

科幻与现实的交织

以科幻、奇幻的方式为小说注入未来感,是青年作家们触及现实的又一尝试。

威廉的小说《潜居》从题目来看就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城市青年的生活状态。小说加入诸多科幻元素,将背景拉至科技高速发达的“后人类”时代。当硅胶机器人成为情感的寄托,人们该如何面对“原子”般的生存空间,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显然,许多人并不满意这种“潜居”状态,他们通过销售旧手机、收听老歌和保留过去的房间寻求自己与“世界”间的联系。这些举动在充斥着比特币、粉丝、大V的“后现代”世界显得格格不入。小说中的歌亨终于启动“琥珀计划”,潜入海底被淹没的故乡,而“我”的目光也终于从硅胶机器人转向了那个阅读《红字》的人类

女孩。而在《野未来》中,威廉则呈现出另一种蓬勃生长的生命力。小说中的赵栋,尽管只是一名保安,但却对城市和科技文明心怀向往。他选择颇具科技含量的机场作为自己的工作地,想象着“时空隧道”建成的可能,在工作之余还研究量子物理学,展现出青年自我成长的坚持。赵栋的房间位处城中村的最深处,但他却从逼仄的“局部”出发,到达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赵栋实践了影像化时代的比喻,将房间铺满连接网络的屏幕,仿佛深不可测的“黑镜”,更像是五彩斑斓的未来,指向更多的可能性。

周于扬的《马孔多在下雨》《鸚鵡螺》《子宫移民》《比天之恩》等小说,同样借助科幻形式打开了未来的多重可能。他在庸常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了迷官、秋千和永动机等奇异的意象,并层层深入,在呈现现代人复杂内心的同时,也打开了一道通往宇宙的大门。

《收获》杂志曾经发起“文学无界”系列活动,希望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以文学达成自我的丰富和拓展。在现代社会,青年的生存状态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确定、流动和变化成为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他们急于寻求一种确定性和认同感,因而以一个个标签和“斜杠”强化自己的特点和“圈子”。这一行为一方面也是身份认同的焦虑,另一方面也是青年们个性化地参与现实和历史的尝试。

帕慕克认为,小说家应该既是“天真的”,也是“感伤的”,在他看来,小说的诀窍就在“能够在说自己的时候仿佛再说另一个人”。当下的青年写作,也在探索着从个人向他人、从局部向整体乃至“无界”的实现路径。相信青年作家们从个体和“局部”、从细节和碎片出发之后,能够找到与历史对话的个性姿态,在人工智能和ChatGPT的包围下,以文学的想象力寻求突围的可能。

(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